

# 东亚共同体建设: 关于现状与问题的思考

刘阿明

(上海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 上海 200020)

[关键词] 东亚共同体; 地区合作; 一体化; 东盟

[摘要] 在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全球区域竞争加剧以及各国在变动的时代保持主体性和安全需求的双重刺激下, 东亚地区合作近年来取得了很大进展。在东亚一体化建设的过程中, 东盟、东盟+3、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等各种机制都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推动东亚地区逐渐以一个整体出现在国际事务中。由于目前东亚内部还存在很多矛盾和不确定性, 东亚从一个多国家的地区真正建设成一个面对共同挑战、拥有共同愿望和命运的地区共同体仍然任重道远。

[中图分类号] D81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099(2010)01-0049-09

## East Asia Community Building Thinking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Liu Ami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hanghai 200020, China)

**Keywords** East Asia Community Regional Cooperation Integration ASEAN

**Abstract** Given more and more severe competition among regions caused by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increasing demands for independence and security of countries in a changing era, the East Asia regional cooperation has been enhanced greatly in recent years. During the process of integration, ASEAN, ASEAN+3, ARF, EAS and other institutions are playing different roles respectively to drive East Asia gradually emerging as a whole in dealing with international affairs. However, since there are many contradictions and uncertainties, it is still a long and tortuous way to go in order to build the East Asia region composed by many individual countries into a Community with shared visions and sense of destiny to address common challenges all countries face.

21世纪初, 随着世界政治和经济的重心日益向东亚地区转移, 这一地区的经济融合、安全关切以及蕴涵一体化特征的地区主义的发展正越来越引起外界的关注。自2001年东亚展望小组(EAVG)在其报告中首次呼吁东亚向一个“和平、安全、繁荣和进步”的地区共同体迈进后<sup>[1]</sup>, 东亚合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建立了诸多致力于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多边机制和国际倡议性组织<sup>[2]</sup>, 如亚太经合组织(APEC)、东盟+3(APT)、东亚峰会(EAS)等等。东亚地区机制的产生和发展为东亚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平台和动力。虽然东亚共同体建设目前仍处于相当初级的阶段, 但它却是更加深

刻的政治和制度性挑战的结果。本文通过解读塑造东亚地区秩序的政治和经济力量, 分析建立东亚共同体的主要分歧和努力, 考察东亚地区构建的特点和成因, 旨在以发展的眼光探求构建东亚共同体的新的动力及其政治经济要义。

### 一 变动中的东亚: 对地区合作的渴望

冷战结束后, 东亚发生了巨大的战略和经济变化, 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地区制度或组织。这些机制既扩大了地区内国家合作的范围, 也增加了它们之间的战略不确定性。探究过去

\* [收稿日期] 2009-10-27

[作者简介] 刘阿明, 博士, 上海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副研究员。

20年间东亚何以能建立为数众多的地区机制，三个因素的作用尤其重要，即冷战的结束及其影响、中国崛起改变中美日战略三角关系、东盟对提升成员国外交独立性以及对自身在东亚一体化过程中的相关性的持久重视，它们构成了东亚合作的主要推动力。

首先，在长期的冷战过程中，东亚形成了两个重要的后冷战时代地区构建的基础。一是美国的“轴辐体系”（hub and spokes system）军事联盟。为了冷战的需要，美国自二战结束后就与亚洲主要非共产主义国家——如澳大利亚、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结成安全伙伴。这种“轴辐体系”今天仍然是东亚地区主要安全结构的基石，它推动东南亚国家无顾虑地发展与中国的关系，从而可能在东亚地区一体化进程中容纳中国的影响，并促使美国必须参与“任何重要的东亚或亚太地区机制”的想法得到美国的东亚盟国以及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的最强有力的支持<sup>[3]</sup>。二是东盟的建立与发展。东盟成立于冷战进行得最激烈的1967年。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通过提高地区自治能力、保护国家的自主权，以达到不受任何外部大国控制仍然是东盟追求的根本目标。冷战的结束以及全球意识形态对立的缓解为东亚地区构建注入了四种动力：各国的关注点转到加强出口导向的经济；消除了冷战在东亚造成的分歧及其对地区合作的限制，东盟的扩大纳入了以前被排除在外的东亚大陆国家；加深了美国可能不会建设性地介入而是要撤出东亚这样的担心；促使美国不仅愿意与其盟国甚至考虑与前冷战的敌人进行地区安全合作安排，作为对“轴辐体系”的补充<sup>[4]</sup>。

其次，中国的崛起为中美日战略三角加入了新的复杂性。一方面，中国力量的上升以及随之而来的国际声望的提高既对后冷战时代美国单极霸权形成了最大冲击，又对日本作为东亚最强大、最有影响力的国家的地位构成了挑战。另一方面，日本则开始怀疑美国的全球注意力过于分散可能会导致其对亚洲的关注不足，进而危及日本的地区地位。这些新的战略不确定性导致三个国家的决策者相互产生担忧：美国担心中日共管东亚；中国担心美日轴心在东亚地区对中国形成战略遏制；日本担心中美排除日本达成什么协议，从而使日本在地区中更加边缘化。因此，任何一方都不愿因为过于依赖三方中的一方而在中美日战略三角中地位下降或过于脆

弱，任何两方的过于接近都会被看作具有损害第三方利益和地位的战略影响力<sup>[5]</sup>。

这种担心客观上加强了三大国对一种包容性地区秩序构建的重视。2000年中国提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承诺到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国主导了对APT范围内的最惠贸易协定和东亚自由贸易协定的研究，被视为APT进程以及东亚地区合作的一个主导力量。中国支持各种地区机制，包括倡导召开EAS成为第一个提出承办EAS的非东盟国家。日本既希望在亚洲继续充当美国最值得依赖的盟友，又不愿错失任何有可能影响东亚一体化进程的机会<sup>[6]</sup>。2003年日本与东盟签署《东京宣言》宣布将建立东亚共同体作为双方关系发展的长期努力目标。当意识到APT已被中国占尽先机后，日本开始积极主张将EAS的成员扩大，明确提出把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纳入进来。美国从地理位置上说不是东亚国家，但在东亚具有重要的战略和经济利益，确保该地区不出现一个可能与之竞争的国家或国家集团是美国东亚政策的传统基石。鉴于此，美国对东亚合作没有兴趣，尤其坚决反对东亚形成封闭的、排他性的地区贸易集团，希望继续利用APEC这样的地区制度为其利益服务<sup>[7]</sup>。简言之，两面下注成为三大国的共同战略，即一方面发展与其他两大国的关系，一方面强调与东亚中小国家的关系，并在地区机制构建中积极努力，分别以APT、APEC和EAS为依托，试图推动地区一体化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最后，作为东亚最早的地区组织，东盟一直对东亚地区的一体化进程极为重视。东盟国家大多敏感又脆弱，希望尽可能避免作出任何利益选择，因为这样的选择意味着未知的风险，而这种风险往往是它们无法承担的。所以，它们更愿意在强调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与美国开展安全合作。虽然它们将美国看作是其内部及外部安全的重要保障，但却不满美国专注于反恐问题和理想主义的政策宣示，更反对美国在人权、治理等国内问题上指手画脚。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为所有东亚国家提供了广阔的商品市场和日益强大的投资源泉，客观上为东亚小国进行地区机制建设提供了强大驱动力。可以说，东盟国家对于中国崛起如何影响地区形势看法各异，态度相当矛盾。一方面，它们希望搭乘中国的经济顺风车，将中国视为能够为东亚提供发

展、维护东亚共同利益以及保证东亚持久稳定的源泉<sup>[8]</sup>，倾向于将国家的稳定和繁荣与中国的前途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不少国家又将中国视为潜在的安全威胁。一位泰国高级外交官说：“中国现在居高临下，我们所有人的问题就是要保证这是一个福音，而不是祸根。”<sup>[9]</sup> 鉴此，东盟国家总体上对中国采取了一种综合的接触政策。它们不愿被迫在美国与中国之间做出战略选择，成为美国遏制中国影响的代理人，而是希望中美能够在东亚地区实现利益共存，其方法就是以一系列的地区机制安排将两国捆绑在一起，进行本区域联合管理。冷战结束后，东盟内部关于东亚地区构建的考虑更进一步。为了保持对东亚地区的持续相关性以及继续成为东亚一体化进程的驱动力，东盟力促东亚地区机制纳入所有地区外大国，从而达到没有任何一个大国在东南亚乃至东亚地区取得霸权地位的战略目标<sup>[10]</sup>。

## 二 东亚地区现存制度安排

近年来，东亚国家在稳定的双边关系与共同规范的基础上协同努力，逐渐在本地区发展出一种多边框架，直至提出建设东亚共同体的构想。自20世纪90年代起，解除了冷战束缚的东亚地区迎来了地区机制构建和发展的春天，如APEC的快速扩大、东盟扩展到覆盖整个东南亚、亚欧峰会(ASEM)的创设、东盟地区论坛(ARF)在1994年召开首次峰会、APT的发展等等。如今，以东亚国家为主要成员的地区多边合作机制多达250个，分别处理经济、安全、政治等事务。其中，东盟、APEC、ARF、APT以及EAS作为主要的首脑会议机制得到了大多数东亚国家的支持和全球关注，反映了目前东亚地区机制的现状特点。

在所有地区机制中，东盟存在时间最长，是迄今为止东亚地区一体化进程的核心。作为一个地缘政治及经济共同体，东盟致力于以和平方式在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实现发展，并推动地区和平与稳定。东盟设有秘书长，有着发展成熟的机制进程体系。同时，它也是一个内向性的组织，重视地理范围，并不想把成员扩大到东南亚10国以外。东盟的关注点涉及几乎所有的地区活动，也在有限的程度上处理成员国之间一定的安全关系，但总的来说其成员国保留了解释或忽视东盟集体决定的权力。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东盟发展出了一种特殊

的“东盟方式”以实施冲突管理，即避免具有法律效力的协定，注重组织结构的非正式性和协商一致的原则；主张在参与者中间创造友好包容的氛围；重视第二轨道或称学界和思想库之间对话与协商机制的作用。亚太地区的其他多边机制如APEC，随后也仿效了这种风格来处理多重轨道上的政治事务<sup>[11]</sup>。为了推进东盟自由贸易协定(AFTA)谈判以加深经济一体化，东盟专注于加强与外部大国的对话伙伴身份来帮助确保自身的未来。这种努力催生了APT进程和EAS、ARF和ASEM这样的多边机制，显示出东盟在构思和建立范围广泛的地区机制方面的关键作用<sup>[12]</sup>。

2009年是APEC成立20周年。上个世纪80年代末，随着冷战在全球范围内趋于平和，美国在亚洲的政治与军事存在很可能即将变得师出无名。作为美国亚洲同盟体系的“南北之锚”，澳大利亚和日本最担心美国从亚洲撤出，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韩国也有同样顾虑。因此，澳大利亚总理霍克(Bob Hawke)1989年1月提出建立一个亚太地区贸易机构的想法，日本政府随即积极推动这一设想，最终形成了机制化的亚太经合组织。起初，APEC是一个外交部长、贸易部长专注于亚洲出口导向的经济动力的会议。1993年，APEC得到加强，建立了一年一度的首脑会谈机制。中国和俄罗斯分别于1991年、1998年加入APEC。APEC的成员国身份有着广泛的跨太平洋的战略维度，严格意义上说其成员国是以经济联系为基础的，但其议程不断扩大，涉及贸易之外的议题，如采取地区共同行动发表反恐宣言。与其初衷相比，APEC取得的成绩差强人意。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其成员国过多，涉及的地域过于广袤、利益过于繁杂，反而使组织的集中权威性变得有限，很难就它所关注的地区贸易自由化问题达成任何有意义的共识<sup>[13]</sup>。

ARF的建立源于东亚政治结构的变化。冷战结束后，东盟国家意识到，如果东盟还想保持在后冷战时代安全环境中的重要性，它就应该确保在程序上主导亚太地区的安全语境，于是ARF于1994年在东盟外长会议后得以建立。ARF把东亚的两个次区域——东南亚和东北亚与欧洲、北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家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安全论坛。这个机制没有秘书处，而通过每年一度的外长会议，由东盟轮值主席国主持，关注综合安全事务。ARF只是一个为了对话而建立的论

坛,不是一个行动的集体安全组织,其目的是为了在解决特定的地区争端,也拒绝讨论像台湾问题、朝鲜半岛的未来等敏感的安全问题。其目的是分享信息、降低不确定性、建立信任,从而在更长远的意义上影响国家目标和实现长期的和平<sup>[14]</sup>。ARF反映了东盟喜好一致外交的战略,这种战略是为了控制问题而非解决问题。这就是为什么ARF无法从其最初的水平——促进信任建立——转向第二层面,即预防性外交或成熟阶段(冲突解决)。由于缺乏权威性以及做出决定并采取行动的能力,许多人说它只不过是个“清谈会”<sup>[15]</sup>。

如果说ARF是东盟向亚太地区和安全领域的扩展,那么APT就是一个将东北亚大国与东南亚小国联盟联系在一起的、以处理经济事务为目的的机制。这种更紧密的东亚合作形式既来自于对美国在1997年金融危机时不愿援助东南亚的失望情绪,也来自于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启示。近年来,APT进程取得了重要成果。1998年APT成员国同意举行定期峰会以及外长和财政部长会议。2000年APT在泰国峰会上达成《清迈倡议》(Chiang Mai Initiative),实现各国中央银行之间的货币交换安排,建立了巨大的金融储备,成员国凭此可以抵抗未来投机行为对其货币的打击,也使东盟国家有了除西方控制的MF之外的另一个选择。不过,虽然APT成员国更接近于完美意义上的东亚身份,但由于没有核心机构和集体权威性,并且关注点也较狭隘,它被称为“进程”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际/地区组织。2004年,中国建议由APT发起一个新的东亚峰会,把APT合作进程扩展到包含安全在内的更广泛的领域。

EAS是迄今为止最新的东亚合作机制。从其成员国身份来看,它包括APT和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亦称“10+3+3”),是一个介于东亚地区机制APT和亚太地区组织APEC之间的机制。EAS于2005年召开首次会议,最初的目的是从相对狭窄的经济议题慢慢转向处理“安全、民主、善治、法治以及人权的各个方面”,讨论包括从提升全球安全规范到应对贫困再到建立东亚各国社会之间、人与人之间联系的广泛议题。目前,EAS还算不上是一个正式的机制,只是一个囊括了东亚和太平洋国家的非正式的战略论坛。它没有秘书处,没有组织机制,也没有权威性,其成员国、目标和机制规则甚至也未固定下来。相比东盟作为东亚共

同体建设的“驱动力”,APT进程作为“主要轮子”,EAS在东亚共同体建立过程中只起到第三的作用<sup>[16]</sup>。它始终面临着亚太地区概念和东亚地区概念的分歧。EAS的扩大是与传统大国日本和新兴大国中国之间在东亚的外交竞争分不开的。日本促成了EAS的扩大,正努力使其发展超越简单的论坛性质。中国则继续强调它的补充地位<sup>[17]</sup>。

东亚地区日益加深的经济相互依赖和一体化进程导致了东亚共同体概念的产生,但由于该地区现有机制内部和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对于哪一个机制应成为东亚共同体的雏形并没有共识。这种地区合作机制发展的现状决定了东亚地区一体化或东亚共同体的建设要考虑以下事实:

第一,东亚合作始于实际需要,而没有一个预先设计好的政治目标。经济合作和一体化为东亚地区主义提供了基本的利益基础。东亚地区一体化的发展需要是显而易见的,共同体概念就是被“1997年金融危机及其后一系列地区危机所强调——自2002年10月以来,巴厘岛以及东亚地区其他地方发生的恐怖袭击、2003年SARS的爆发以及2004年印度洋海啸的发生都说明,地区共同的脆弱性加强了跨国灾难的复杂度,这种灾难对传统的国家边界是无所顾及的。”<sup>[18]</sup>跨国威胁需要国际合作来应对,而合作必然需要制度来维系。共同体将各国对问题的反应集中起来,通过集体行动解决地区事务,反之导致了“合作的习惯”的产生,这种习惯正是繁荣、稳定和和平的核心,也是建立规范和行动准则的初始方式。

第二,东亚地区小国林立的现实一方面使这些国家意识到相互依赖的重要性,加强了一种共识,即本地区联合起来应对外部力量;另一方面在推进地区内部合作和一体化的同时,单个成员国或次区域集团也同外部国家发展双边或次地区合作关系。换言之,东亚共同体建设允许存在多层次框架,也认同现有的双边联盟和其他协定。双边接触虽然仍是地区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东盟峰会就是以一系列双边协议而引人注目的<sup>[19]</sup>,但此类接触无法产生更大的集合以达成更具约束性的协议或通过强化对现有机制的构建来应对新的问题。由此看来,东亚共同体建设进程无法创建一个排他的或内向封闭的地区认同。

第三,由于东亚地区的文化多样性、历史经验差异性以及现实需要的不同,地区国家间利益的相

互矛盾使得任何共同体建设努力都非易事。这种差异性的普遍存在,决定了东亚地区众多机制相互重叠、相应而生,不可能为一个机制或组织所统筹,只能以多种方式、多个目的加以整合。东亚共同体的建设,要在包容东亚内部极大的多样性,尊重各国政治体系、社会结构以及文化属性的差异性的原则下进行,这注定是一个多种机制相应出现、共同发展和生长的动态过程。至于哪一个机制可以在其中脱颖而出,最终成为东亚共同体的领导机构或有着足以勾画出东亚共同体的蓝图或总体设计的代表性,则尚无定论。

### 三 东亚共同体建设: 问题与未来

东亚是一个充斥着多样性和复杂性的地区,各国从发展程度到地理位置、从自然条件到人种分布、从宗教信仰到文化传统都有着极大的差异。在地区国家的共同努力下,东亚合作取得了不错的进展,但对于寻求建立更高层次的共同体目标,这种合作努力还是远远不够的,东亚共同体建设在其组成、目的、效能等方面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

#### 1. 东亚还是亚太?

长期以来,东亚有两个相互重叠的地区构建在同时发展。一个是包括美国等太平洋国家在内的亚太构建,以 APEC 为其最重要的地区机制;另一个是狭义上的东亚构建,以 APT 进程为其主要代表。这两个机制在成员国身份上的差异性在 2005 年首届东亚峰会上表现得一览无余。中国和马来西亚坚持狭义的东亚概念,不打算把美国纳入 EAS,但其他东盟国家以及日本担心中国的主导作用,主张扩大成员国身份,最终 EAS 形成了未包括美国却纳入其亚太盟国和友邦的“10+3+3”论坛<sup>[20]</sup>。对成员国身份的不同认知必然影响到东亚一体化进程的发展由此可见一斑。其中的核心问题是美国对东亚一体化的作用到底如何,以及东亚国家对此种作用如何评估。以美国外交的风格来看,它往往对进程和对话缺乏耐心而一心想快速得到结果。美国之所以对东亚共同体建设表现不积极,一是因为它对亚洲蓬勃发展的多边主义心存疑虑,认为东亚合作在解决地区迫切的政治、经济和安全挑战时反应迟缓;二是它仍希望通过 APEC 和 ARF 来处理亚太地区的经济和安全事务,或选择多边机制来解决特定地区的问题,如以六方会谈解决朝鲜核问题<sup>[21]</sup>。

当然,即使美国全心全意地支持东亚共同体建设并希望成为其中的一员,东亚国家也不一定都对此表示欢迎。马来西亚一度是狭义东亚地区概念的强有力的倡导者,相反,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是东盟内部对广义的亚太地区主义的最有影响力的支持者。

不过,即使美国从不参加东亚峰会,亚洲国家仍然会把它看作是一个对话伙伴国。任何关于如何应对全球挑战的讨论,从能源安全、环境恶化、跨国犯罪到反恐战争,从贸易、投资到金融,都须把美国包括在内。对大多数东亚国家来说,美国的军事存在、经济介入仍是无法替代的,“美国不需要成为东亚地区机制建设的方方面面,但它不能也不应该被排除出东亚”。<sup>[22]</sup>总之,亚太地区的核心是东亚,东亚共同体建设短期内应集中于东盟,长期内应集中于 APT,最终则不可避免地涉及到美国、澳大利亚、俄罗斯、蒙古等一些外围国家。

#### 2. 从地区合作到渐进式一体化?

共同体建设要求超越一般性的技术和功能性合作,构建基于共同利益和目标的身份认同和价值观。这正是合作和一体化的区别所在。前者是指国家间的行为和安排,为采取集体行动而在政策层面进行协调,例如信息共享、宏观经济政策的联合等等;后者是指一个将不同的国家利益整合在一起的过程。前者由国家或机构主导,而后者则包括市场、社会、国家等方方面面的努力。合作的目的是导致一体化,尽管这并不是必然的。东亚共同体建设就是使一些传统的地区合作机制逐步向一体化迈进。

繁杂的机制虽然反映了东亚地区合作的现状,但也导致目前没有一个机制或进程能在东亚共同体建设过程中居于主导性地位。如果要发挥这样的作用,就不得不对机制的成员国身份、文化和程序进程等进行大规模调整。这种调整可以通过两个办法予以实施:一是增进所有主要机制之间的关系,以渐进的方式或现有的联系将现存地区机制建设成为东亚共同体的基础,二是发展出一个新的构建来承担确保地区安全和繁荣的责任。如果现存机制无法催生更多更深入的合作,那么东亚新的地区构建就显得尤其必要且意义重大。在全球层面上,这样的地区机制会将一个新的行为体引入国际政治,从而对世界格局形成冲击。在地区层次,一些诸如权威性、法律性的问题必须得到解决。在国家层面,这样的超国家的地区构建会限制和削弱国家主权。

### 3. 东盟主导还能走多远?

东盟以其地区合作的先行经历,在把东亚地区凝聚到一起以及确定其走向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东盟提供了一种独特方式,将所有国家逐步整合进东南亚地区合作框架,并通过基于功能性合作的渐进过程实现地区和解。东盟方式对于建设东亚共同体的路径和方式的影响尤其重要<sup>[23]</sup>。首先,东盟利用自己在东亚地区机制建设中的先发优势,制定一系列规定确保在以后的地区机制建设中处于主导地位。以东亚峰会为例,东盟为其设置了三个条件: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TAC),成为东盟对话伙伴国,与东盟建立“丰富”的关系。东盟规范和实践很有影响力,其方式的非正式性、自愿行动性、缺少机制化约束的特点均渗透于APEC。其次,东盟国家利用各大国之间客观上存在的利益矛盾,采取平衡战略,既欢迎美国的军事存在并提供基地,但拒绝新的正式的军事同盟,又与中国、日本保持良好关系,搭乘两国经济发展的便车,由此保证了自己在大国博弈中的主体性。

东盟的分而治之战略目前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可以说,在地区一体化的早期,大国为影响力的竞争确实让东盟中小国家发挥了重要的地区作用。但是,随着一体化进程的深入,大国对东亚共同体发展的作用日渐凸显。毕竟东盟总体上缺乏重要性。东盟10国的经济只比韩国或澳大利亚的大一点,这使得东盟是否具备足够的信心和能力继续领导东亚迈向一个更大的地区构建成为疑问。例如,《清迈倡议》目前建立的1200亿美元稳定基金中,中日韩三国的份额达80%,东盟国家的出资只有20%。东盟在东亚制度化建设过程中的身份和作用诚然应该得到尊重,但是,东盟本身也必须适应东亚地区的新发展。

### 4. “民主国家同盟”还是开放的地区多边主义?

在东亚地区秩序的构建中,中国和日本的作用日显重要。随着中国力量的上升以及积极的地区战略的实施,日本感到危机和脆弱。自安倍政府起,日本采取了一种“双轨政策”,一方面加强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一方面发展地区主义加强与地区国家的双边关系。2007年3月,日本与澳大利亚签署安全宣言,这是日本自1960年以来与美日同盟之外的国家首次缔结双边安全协定,标志着日本从绝对的双边主义转向相对的多边主义,即结成所谓的

日本—澳大利亚—美国—印度“民主同盟”。这种做法不仅与美国的利益不谋而合,也对地区安全秩序产生了显著的影响<sup>[24]</sup>。宣言中多次提到日澳之间“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安全利益”以及“在应对地区和全球安全挑战中正在进行互利的合作”等感性词句<sup>[25]</sup>,体现了日本为确保其在东亚地区独大的地位,与其他亚太地区国家一起组成遏制同盟、平衡中国崛起的意图。

但日澳接近并没有维持太长时间。其原因不仅是日澳国内的政治倾向随着政府更替而改变,也不仅仅是因为这四个国家中的任何一个都不愿被看作是在亚洲反对中国的遏制同盟的领导者,更重要的是,日澳追求的是一种在美日同盟基础上放大的小多边主义(minilateralism)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多边主义,它寻求建立一种新的排他性组织而不是包容性组织<sup>[26]</sup>。由于地理因素、历史上的敌意、政治上的不信任以及面临两难选择的境地,其他国家如韩国、加拿大、新西兰十分怀疑这种将它们排除在外的战略同盟。实际上,保持开放性和包容性是东亚共同体建设的关键。东亚共同体在寻求和谐的同时必须尊重彼此间的差异,这意味着不应该设立一些要求所有成员都遵守的共同价值或原则。

### 5. 不干涉原则还是普世价值观?

自上个世纪中期殖民主义撤出东亚后,东亚各国新政府特别注重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原则,并将之视为立国的基石。在冷战时期,面对两个阵营的争夺,这些政府更是牢牢坚持其自主性,在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原则的名义下,拒绝一切正式的和强制性的决策过程或由于不遵守条约而受到处罚的规定<sup>[27]</sup>。东盟的统一哲学基础和最基本的组织原则就是保护国家主权。因此,东盟不可能将民主治理作为对制度成员资格的关键要求。相反,东盟对非民主政体予以通融。它抵制了针对缅甸军政权的国际压力,赞成建设性接触<sup>[28]</sup>。

然而,随着东盟的扩大和时局的发展,不干涉原则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1997—1999年,越南、老挝、柬埔寨以及随后缅甸加入后,出于新成员国的内部条件不致损害东盟国际声望的考虑,东盟国家在国内良治与地区稳定和安全之间、在地区共同发展与成员国主权保护之间的矛盾开始显现并逐渐突出。在新世纪应对恐怖主义也构成了对不干涉原则的侵害。泰国、菲律宾建议修改东盟不干涉成员国内部事务的原则规定,引起了东盟内部的争

论。此外,日本多次声称,东亚共同体的建设应该是建立一种“原则性的多边主义”,以通过加强民主、法治和善治来弥合亚洲多样化的政治体系之间的差异<sup>[29]</sup>。面对这种状况,东盟最新的反恐条款于2007年1月开始生效,要求成员国共享情报、加强人员训练合作、切断恐怖主义组织的资金以及不给恐怖分子提供庇护所。2007年11月《东盟宪章》达成,首次要求其成员国走向民主、良治和保护人权。但宪章同时确保东盟人权处于东盟的基石性原则——不干涉原则的统辖之下,任何制裁成员国的行动必须得到一致同意<sup>[30]</sup>。

其实,任何有效的一体化机制都不可避免地对国家主权产生影响,但主权的共享和让渡是在民族国家行为体达成共识和一致的基础上发生的。问题的关键是确保机制能够有效地处理地区事务。世界上本不存在什么普世的价值观和认同感,只有以地区为依托,根据地区的不同情况探讨主权的让渡,而不是逼迫各国采纳某一种价值理念,才可能促成国家将对其行为的某种限制作为地区共同体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予以接受。

#### 6. 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地区共同体?

东亚合作的现存机制由于在外溢到政治和安全领域时遇到不小的阻力而集中关注经济和贸易问题,从而导致东亚一体化的经济支柱正变得日益强大,政治支柱的发展却相对落后。但东亚共同体建设是一个综合全面的过程,包括经济、政治以及社会诸领域的机制建设,最终要如《东盟宪章》所宣示建成东亚经济共同体、安全保障共同体和社会文化共同体,通过三个共同体的统一实现完全意义上的东亚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是东亚各国经济起飞后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其中心任务应以自由贸易为核心,通过双边和多边安排逐步加深地区的经济合作。APT将是该地区经济和功能合作的主要机制,它应注重实效并对与此计划相关的机制成员国开放。关于安全保障共同体,虽然对东亚来说目前建立具备抑制力的统一军事机能还不现实,但可以考虑以ARF和六方会谈机制为中心,通过对话开展预防性外交,应对跨国境的非传统和传统安全的共同威胁,以此为基础建立地区安全保障体系。社会文化共同体的构建居于东亚共同体建设的核心位置,关键是实现地区内所有人的安全和建立对东亚的归属意识。地区机制的主要作用不是进行超国家的干预,而应着眼于地区成员国间的团结、和解

和合作,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广泛交流,发展出一种共享的共同体精神和文化。

这些目标是相辅相成的。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导致足够的相互信任和一定程度的安全合作;在应对非传统安全特别是与“人类的安全”密切相关的环境、传染病、毒品、人口买卖等跨国威胁时,遍及区域内部各个领域的网络的动员或许能提高人们对东亚共同体的归属感;在消除贫困和地区差异,实现共同发展、繁荣和稳定的过程中强化东亚的概念,有助于建立东亚或亚洲的价值观和地区认同。由此,一个完整的东亚共同体的轮廓就得以出现。

## 四 几点思考

建立东亚共同体是一个长期的努力目标,东亚地区本身的差异性和共同体发展的自身规律决定了这个过程是缓慢的、渐进的和功能性的,并将深入涉及域内外国家的战略选择和政策反应。对很多东亚国家来说,国家建设和政治稳定是当务之急,而一体化只是一个长期的战略;对另一些国家来说,东亚共同体只是一个战术性、服务性的外交目标;更有一些国家把它看作是可以容忍的或有时要加以阻止的。虽然存在很多困难和分歧,但不进行一体化的代价是巨大的,会动摇并可能将东亚中小国家推入地区大国的无休止的竞争之中。

美国在历史上、贸易上和观念上与亚洲有着无法割断的关系,它一直是这个地区安全、经济和社会组织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遭遇伊拉克重建的挫败、阿富汗治安形势的恶化以及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萧条后,美国在全球的影响力有所下降,但长远来看美国在军事实力和经济潜力方面所占的优势地位不会发生变化。它在东亚地区联盟和安全伙伴关系的基础仍是牢固的,依然是东亚国家可以选择的唯一安全合作伙伴。美国需要理解东亚共同体的发展来自于这个地区天然的建立一致认同的渴望以及亚洲地区主义正在成长的现实。如果美国继续对这个问题采取狭隘的视角,那么它注定会失去对东亚的影响力<sup>[31]</sup>。它不一定要加入东亚峰会以及其他关于亚洲未来的对话和决定,但它一定要传递出更加积极的信号,并以一种建设性的姿态倾听亚洲的声音<sup>[32]</sup>。如果美国想要延续在亚洲的存在,那么它的政策无疑应该反映东亚共同体的现实,并对其盟友和伙伴不断变化的利益和关注点保持敏感,

包括更大程度地参与该地区经济和安全机制并为之做出贡献。

中国位于亚洲中心地带,被大小14个国家包围着,中国的发展和其安全取决于它的地区周边战略。东亚对中国来说具有重大地理意义,与邻国的和睦关系为中国的发展和现代化创建了一个长期的和平环境。尽管中国把APT视为东亚共同体的核心路径,但对于接受和参与多层次体制架构如东亚峰会、APEC等又持包容态度。就此而言,中国的地区主义是灵活而开放的。中国参与亚太地区建立的地区多边机制,同时中国自身的价值取向反过来也会对上述机制施加影响,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的政策所体现的那样。正是因为中国,东亚一体化的某些进程才得以进一步提速。在目前全球金融危机形势下,中国由于有着独特的发展模式、雄厚的外汇储备、庞大的内需市场等优势,将会在各种区域合作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问题在于,美中两国各自倡导的行为标准是否会形成冲突,以及能否对美中两国价值观兼容并蓄。而若要加强东亚地区多边机制的地位并使之成为地区和平做出贡献,其方法可能是,使这些机制东西合璧,即从东西方传统精华中汲取行为标准、价值取向和惯例。这样的机制显然有助于建立共识并推动共同体建设的发展<sup>[31]</sup>。

日本在心理上远离亚洲,但其命运与这一地区紧密相连。如果日本能有自己完整的东亚战略和发展规划,而不是将之放在与美国关系框架内或遏制

中国的战略指导下,那么东亚共同体的前景将更加乐观。作为小国的东亚其他国家乐见中日两大国关系良好,中日在APT框架内为合作创造更多的机制不仅可以使这些国家避免在中日纷争时做出艰难选择,而且可以持续地传递两个地区大国克制和和解的信息<sup>[34]</sup>。值得注意的是,东京与北京超越了相互之间的政治担心,并与韩国联合起来,组成了新的“三方伙伴关系”。由于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催化和三方的努力,东亚范围内的金融货币合作有可能加快,改变过去几年来区域货币合作进展缓慢的现状。在这种情况下,新的三方伙伴关系可以视为一种防范正处于相对衰退之中的美国风险的政治手段。

目前,东亚各国的经济快速增长,区域内贸易的增速几乎是世界贸易增速的两倍,区域内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速也相当可观,东亚已经成为国际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个经济上充满活力、战略上不确定的地区,东亚急需更加制度化的地区合作以增强自身的力量。由于东亚长期增长的动力越来越多地来自于内部,且由地区内国家组成的新的力量中心日益发挥作用,东亚合作正在回归其正常形态。亚洲现在既有能力也有意愿成为世界其他地区的伙伴。在经济、国家建设、反恐以及全球变暖方面,这个地区提供了有价值的意见和资源<sup>[35]</sup>。东亚乃至整个亚洲正在恢复其主体性。建立东亚共同体的努力既反映了这种趋势,也是这种趋势进一步发展的必要选择。

## 【注 释】

[1] East Asia Vision Group *Towards an East Asian Community: Region of Peace, Prosperity and Progress* 2001.

[2] Richard A. Bitzinger and Barry Desker, "Why East Asian War is Unlikely?", *Survival*, Vol. 50, No. 6 December 2008, pp. 105-106.

[3] Denny Roy, "Southeast Asia and China: Balancing or Bandwagoning?",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27, August 2005, pp. 305-321.

[4] Dennis C. Blair and John T. Hanley Jr., "From Wheels to Webs: Reconstructing Asia-Pacific Security Arrangements",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4, No. 1, Winter 2001, pp. 7-17; Evelyn Goh,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in United States East Asia Strategy", *The Pacific Review*, Vol. 17, No. 1, March 2004, pp. 47-69.

[5] Aurelia George Mulgan, "Breaking the Mould

Japan's Subtle Shift from Exclusive Bilateralism to Modest Multilateralism",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30, No. 1, April 2008, p. 59.

[6] Yeo Lay Hwee, "Japan, ASEA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n East Asian Community",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28, No. 2, August 2006, p. 268.

[7] 陈志敏:《北约、亚太经合组织和亚欧会议:地区间主义和全球秩序》,载庞中英主编《中国学者看世界》(全球治理卷),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第255页。

[8] Wang Gungwu,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The Context of a New Beginning", in David Shanbaugh ed., *Pavement Shift: China and Asia's New Dynam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6, pp. 187-199.

[9] David B. H. Denoon and Wendy Friedman, "China's Security Strategy: The View from Beijing, ASEAN, and Washing



ton", *Asian Survey*, Vol. 36, No. 4, April 1996, p. XXXVI.

[10] Amitav Acharya and See Seng Tan, "Betwixt Balance and Community: America, ASEAN and the Security of Southeast Asia",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 6, No. 1, 2006, pp. 37-59.

[11] 〈美〉彼得·卡赞斯坦著, 秦亚青、魏玲译《地区构成的世界——美国帝权中的亚洲和欧洲》,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 第146页。

[12] David Martin Jones and Michael L. R. Smith, "ASEAN's Initation Community", *Orbis*, Vol. 46, No. 1, Winter 2002, pp. 93-109.

[13] John Ravenhill, "APEC Adrift: Implications for Economic Regionalism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The Pacific Review*, Vol. 13, No. 2, June 2000, pp. 319-333.

[14] 〈美〉彼得·卡赞斯坦著, 秦亚青、魏玲译《地区构成的世界——美国帝权中的亚洲和欧洲》, 第152页。

[15] Barry Desker, "The Future of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PacNet*, Newsletter 36, September 7, 2001.

[16] "Kuala Lumpur Declaration on the ASEAN Plus Three Summit", <http://www.aseansec.org/18036.htm>, 2005-12-12. "Kuala Lumpur Declaration on the East Asia Summit", <http://www.aseansec.org/18098.htm>, 2005-12-14.

[17] Thomas J. Christensen, "Fostering Stability or Creating a Monster? The Rise of China and U.S. Policy towards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1, No. 1, Summer 2006, pp. 81-126.

[18] Amitav Acharya, "The United States and East Asian Community", *Future World Affairs*, February 3, 2008, <http://futureworldaffairs.blogspot.com/2008/02/united-states-and-east-asian-community.html>

[19] Michael Vatikiotis, "US and China Tug at ASEAN Unity", *Asia Times Online*, May 8, 2007.

[20] Jim Rolfe, "A Complex of Structures: Functional Diversity, Regional Consolidation,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in the Asia-Pacific", *Asian Affairs: An American Review*, Vol. 33, Winter 2007, p. 224.

[21] The Stanley Foundation, "Building an Open and In-

clusive Regional Architecture for Asia", *Policy Dialogue Brief*, November 2006, p. 5.

[22] Goh Chok Tong, "Towards an East Asian Renaissance", *Radio Singapore International's Perspective*, February 11, 2006, <http://www.iseas.edu.sg/viewpoint/isil1feb06.pdf>

[23] 张蕴岭:《东亚合作和共同体建设:路径及方式》,《东南亚纵横》2008年第11期。

[24] Aurelia George Mulgan, "Breaking the Mold: Japan's Subtle Shift from Exclusive Bilateralism to Modest Multilateralism", pp. 52-72.

[25]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Japan-Australia Joint Declaration on Security Cooperation", <http://www.mofa.go.jp/region/asia-paci/australia/join0703.html>, 2007-3-13.

[26] Christopher W. Hughes, "Japan's Doctoring of the Yoshida Doctrine", *Asia Policy*, No. 4, July 2007, p. 203.

[27] Ellen L. Frost, *Asia's New Regionalism*, Singapore NUS Press, 2008, p. 219.

[28] 〈美〉彼得·卡赞斯坦著, 秦亚青、魏玲译《地区构成的世界——美国帝权中的亚洲和欧洲》, 第146页。

[29] Michael J. Green and Daniel Twining, "Democracy and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in Asia: the realist principles behind an enduring idealism",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30, No. 1, April 2008, pp. 16-6.

[30]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The ASEAN Charter*, <http://www.aseansec.org/ASEAN-Charter.pdf>

[31] The Asia Foundation, *America's Role in Asia: Asian and American Views*, 2008, p. 3.

[32] Yoichi Funabashi, "Keeping Up with Asia: America and the New Balance of Power",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08, p. 120.

[33] Richard A. Bitzinger and Barry Desker, "Why East Asian War is Unlikely?", pp. 122-123.

[34] Yeo Lay Hwee, "Japan, ASEA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n East Asian Community", pp. 273-274.

[35] Yoichi Funabashi, "Keeping Up with Asia: America and the New Balance of Power", p. 125.

【责任编辑: 邓仕超】